

從語言中搜尋意識形態：
van Dijk 的分析策略及其在傳播研究上的定位

倪炎元*

投稿日期：101 年 7 月 3 日；通過日期：101 年 8 月 17 日。

* 銘傳大學傳播管理學暨研究所教授，e-mail: yyni@mail.mcu.edu.tw。

《摘要》

本論文主要針對當代批判論述研究的代表學者 T. A. van Dijk 之分析策略與理論定位進行探討。一方面藉由理論系譜的溯源，還原 van Dijk 所鋪陳的論述／認知／社會的三角互動；另一方面則是透過實例分析的探討，檢視 van Dijk 如何從日常語言文本中解析出一組意識形態的論述。更重要的是，本研究也嘗試為 van Dijk 所揭示的分析策略進行理論脈絡的定位。本研究發現，van Dijk 的分析架構在當代各種論述理論中之所以能獨樹一幟，在於他的分析架構大幅納入語意學與語用學的觀點，這個語言學立場的選擇，使得 van Dijk 的分析策略與文化研究的觀點形成明顯的區隔。本研究同時也發現，在意識形態的研究上，van Dijk 的分析架構確實可以幫助研究者從日常語言的正式文書中，發掘隱藏在其中的意識形態密碼。這一點對台灣媒體文本的研究，亦有相當的啟發作用。

關鍵詞：文化研究、批判論述分析、意識形態

壹、緒論：問題意識的緣起

在當代處理論述或意識型態的文本理論中，Teun A. van Dijk 的批判論述分析架構，是相當特殊的理論模型之一。他的理論觀點觸及了幾個當代最熱門的學術課題與概念，如語言、論述、意識型態等的探討；他所處理的個案，又是當代民主國家最敏感的種族主義課題，而順著他所提示的分析策略，研究者確實可以從一組語言文本中，有效識讀隱藏在其中的意識型態密碼。然而有趣的是，van Dijk 的理論架構，不僅在他所屬的批判論述分析學術社群中獨樹一幟，與當代同樣也關注論述與意識型態的文化研究與批判理論學術社群相較，他的觀點一直呈現某些異質性，這種異質性讓西方學界同樣處理文本、論述與意識型態相關議題的理論工作者很少評介甚至批判他的理論。這其中的緣由固然耐人尋味，但對所有嘗試選用他的理論架構來從事分析的研究者而言，這種後設性的反省恐怕是必要且必須的，對於處於邊陲位置的當代華文傳播學界而言，此一梳理工作恐怕更有必要。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在批判論述分析的代表學者中，van Dijk 的著作或許是被台灣傳播學界援引或參考頻率最高的一位。只要是意圖透過質化途徑對印刷媒體進行文本分析的研究，包括許多傳播學界的先進在內，經常都會引述或提及 van Dijk 的分析策略，而且已經都有若干重要的出版（翁秀琪，1998；張錦華，1994, 2011；臧國仁，1999；鍾蔚文，1992）。這中間除了張錦華在 2011 年出版的研究論文中選用 van Dijk 在 2006 年所發展的分析架構外，多數傳播研究者所依據的分析架構，絕大部分都是依據 van Dijk 在 1988 年所出版的兩本著作，一本是《新聞作為論述》（*News as Discourse*），另一本則是《新

聞分析：報紙國際新聞與國內新聞的個案研究》（*News Analysis: Case Studies of International and National News in the Press*）。在這兩本著作中，van Dijk 不僅提示完整的分析架構，也示範了相關的案例分析。不少傳播學者與研究生即是借助 van Dijk 在這兩本著作中提示的分析策略做出不少重要的研究。如今在學術文獻積累已經達到一定程度之後，應該是一個恰當的時機，針對 van Dijk 在論述分析提出的觀點，進行若干後設性的解讀與批判性的評價。而本研究即是基於此一旨趣，嘗試針對 van Dijk 論述分析架構乃至意識形態研究背後的理論脈絡做一個還原，同時也就其理論架構中所涉及的若干疑義進行檢視，進而探討其對華文傳播研究所可能提供的助益。

儘管 van Dijk 在 1988 年連續出版了兩本討論如何分析媒體文本的著作，但這兩本著作僅是 van Dijk 多達三十餘本著作、兩佰多篇論文中的一個切片。van Dijk 在其它著作中也曾廣泛引述媒體文本的資料，但焦點主要都集中在論述分析的語言學與認知心理學的層面上，後期著作更是鎖定在種族主義與意識型態主題的討論。對傳播學界而言，如果對 van Dijk 著作的引述與參考，只限定在 1988 年所出版的這兩本著作，卻忽略他在前期著作中有關語言學與認知心理學的爬梳，以及後期著作所做的調整與修正，未嘗不是推動相關研究與時俱進上的缺憾。畢竟 van Dijk 的論述分析架構在後期已經做了不少更改與增刪，如果未來的研究依舊完全不觸及這些討論，傳播學界對 van Dijk 論述分析的理解，恐怕永遠只能隔層紗，持續停留在初階的層次。

事實上，這種情況所造成的影響已經反映在國內的相關研究中。許多研究者在引述 van Dijk 的論述分析架構時，都一定會引述他為新聞結構（news structure）所提示的分析策略，特別是他透過總體結構與局部結構的切入方式，正好對應著新聞稿文類中標題、導言、轉接等實務新

聞寫作的格式；這種分析模式為傳播文本的研究帶來很大的助益。問題是，在 van Dijk 架構中占有同樣份量的新聞生產與理解部分，研究者就很少觸及了。這一部分由於涉及認知心理學的範疇，或許是基於學科專業分工的門檻，許多研究者就不太願意將分析觸角帶到這層環節。但很顯然 van Dijk 本人相當重視這部分的討論。研究者假如刻意忽略這一點，那麼在實際操作上就很可能淪為只是單純的語言學分析了。

對 van Dijk 著作選擇性引述的另一個現象，是台灣傳播學界也很少注意到 van Dijk 在意識形態研究上的開發與貢獻，特別是 van Dijk 在 1990 年以後的著作，很少被研究者加以引述。事實上 van Dijk 在一九九〇年代以後，除了持續對批判論述分析的理論架構進行開發，有很大一部分心力是投注在種族主義與意識形態的研究上，同時也在這個領域中出版過不少重要的著作。這中間當然涉及了 van Dijk 在學術問題意識上的轉變歷程：一九八〇年代的 van Dijk，基本上還停留在純語言學脈絡的「論述分析」，但到了一九九〇年代以後，van Dijk 積極加入了「批判論述分析」的學術社群，也同步將他所開發的途徑界定為「批判論述分析」，多了「批判」這個概念，當然也讓 van Dijk 的理論在定位上出現了微調，他開始投注更多心力在實質議題上，特別是民主國家內部的種族主義議題。按照 van Dijk 自己的說法，他的途徑是一種問題取向（problem-oriented）而不是學科取向（van Dijk, 1993a, p. 18）；換言之，van Dijk 的批判論述分析途徑與意識形態研究基本上是不能割裂的，甚至他可能更期待學界關注他在當代意識型態研究上的發現，而不是只將他視為一個提供分析途徑的方法論專家。在當下台灣長期陷入統獨藍綠糾葛，媒體更呈現意識形態分眾化的情況下，van Dijk 在這個領域上耕耘的成果，當然可以在本土傳播研究上提供不少啟發。

本論文嘗試透過對 van Dijk 討論批判論述分析及意識型態的相關著

作進行一次再解讀，除了嘗試梳理其核心理論預設及分析策略外，也嘗試循後設層面的檢視，為 van Dijk 的理論架構在當代文本分析的理論系譜中做一個定位。這個工作在當代西方學界很少觸及，但對華人傳播學界而言，這個工作相當有其必要，理由很簡單：van Dijk 著作中的幾個核心概念，如論述、論述分析、意識形態等，也同樣是當代文化研究與批判學派的相關理論所處理的核心概念，他們都對解讀媒體文本懷有很大的理論興趣。然而 van Dijk 與他們在處理這些概念的方式卻大相逕庭，連帶的對文本的解讀策略也完全不相同，再加上他們之間幾乎沒有任何對話，因而他們之間的差異往往也被低估。特別對華人傳播界而言，如果不曾意識到這其間的差異，在實際操作上很可能會出現混淆或誤用的狀況，這或許是本論文對華文傳播研究所可能提供的最大助益。

貳、van Dijk 的論述觀及其理論基設

van Dijk 所揭示的批判論述分析架構，基本上是由論述／認知／社會的三角互動所構成的。在這個架構中，van Dijk 將「論述」界定為一種社會互動中語言應用的特殊形式，也可以被理解為是一種在社會情境中完整的溝通傳播事件（a complete communicative event in a social situation）。換言之，van Dijk 認為論述既是言語表達的成品（verbal products），也是一個溝通傳播事件。他認為研究者如果要對論述進行解釋，不能僅拘限在語言的內在結構與認知運作，還必須考量此一論述做為一種社會行動，必須置於大的社會文化結構與過程中來理解（van Dijk, 1997b, p. 21; van Dijk, 1998b, pp. 193-196）。這種將「論述」視為特定情境下文本或言談意義的生產或理解的界定方式，比較接近語言學立場的論述觀，與文化研究偏後結構主義的觀點很不一樣，後者視論述

為一組在社會實踐中具規制性的普遍性命題（Mills, 1997, p. 31）。這兩種不同的「論述」觀點，在比較 van Dijk 的分析策略與其它文本分析策略的差異上，都相當重要。

在這組論述／認知／社會的三角互動中，van Dijk 認為扮演最關鍵連結（link）的角色的是社會認知（social cognition），它是「論述結構」與「社會結構」的中介，也是許多批判語言學分析中所喪失的連結（missing link），缺乏了這個環結，根本無法說明社會結構是如何影響論述結構。在這裡「社會認知」被理解為一種心理結構與過程的內在機制，它包括特定團體成員所共享的一組社會信仰，如意見、態度、規範、價值與意識型態等，也包括那些促使這些社會信仰得以有效運作的認知策略，如詮釋、推測、引申、分類、比較、與評估等，它直接介入論述的生產與理解，而針對此「論述」的分析，亦就是分析其社會認知的過程，亦就是所謂「社會認知」如何塑造此一論述生產與理解的過程（van Dijk, 1993a, pp. 37-38）。

接下來的問題是，社會認知究竟如何介入論述的生產與理解？亦就是怎樣檢視論述結構與社會認知的互動（interplay between discourse and social cognition）。van Dijk 指出在經驗上，論述包括了「可觀察」的口語、文字表述、社會互動與言說行為，還包括了在理解與生產這個論述之際所介入的認知再現與策略（the cognitive representations and strategies）。他認為，語言使用者在解讀或理解論述時，會利用從文本和脈絡中所獲得的資訊，或是同一時間內幾個不同層面（語音、語法、語意和語用）同步操作以解讀論述，他將這個心理過程稱之為論述加工的心理學（the psychology of discourse processing）。換言之，為了理解一個論述，語言使用者需預先假設大量的關於社會文化方面的「知識」，沒有這些知識，要確定句子之間的連貫關係，或是建構所謂「宏

觀結構」，都是不可能的，於是「知識」就成為建構脈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van Dijk, 2004）。

問題是，離散在社會情境中的大量知識，有那些部分會構成特定文本的脈絡呢？在 van Dijk 看來，知識做為脈絡資產的一環，被納入「脈絡化的過程」（process of contextualization），需要一個界面（interface），這個界面剛好介於文本與社會情境之間，將社會情境中的知識建構成「脈絡」，而履行這個界面的角色就是「社會認知」。亦即所謂「脈絡」是參與者從社會情境中的相關知識所建構出來的，van Dijk 稱之為「脈絡模型」（context models）。在 van Dijk 看來，脈絡根本不是社會情境，而是主觀的心靈模型（a context is not a social situation but a subjective mental model），它不追問社會情境中有那些成分會影響論述的生產與理解，而是追問在社會向度中如何進行主觀的詮釋與建構（van Dijk, 2003, p. 95）。

也可以說，van Dijk 認為能夠讓一組語句形成局部或整體的連貫，進而發展成一個論述，同時這個論述又能為他人所理解，都是經由居間的心靈模型發揮作用的結果。當然，這個心靈模型既然是主觀的，它必然是獨特且因人而異的，它也必然是會受到客觀外在情境所制約的。因此，當心靈模型在一個溝通對話情境中被啟動，喚起的通常是哪些普遍的、社會所共有的知識，而其中更關鍵的是心靈模型能夠回憶起多少這樣的知識。van Dijk 認為，心靈模型的結構不是任意的，也非一成不變的，而是依照某種思維中的「基模」（schema）所組成的，這個基模隨著個人經驗與環境變化而不斷更新，也就是藉著這種基模的策略性操作，論述與整個互動交際的情境得以相適應。換言之，就是藉由脈絡模型的操作，社會、文化的普遍知識與個人結合，使得社會情境與論述得以構連（van Dijk, 2008, pp. 99-101）。

總結的說，van Dijk 認為，藉由脈絡模型的操作，可以直接掌控論述的生產與理解。而這其中扮演關鍵機制的基模，只要碰到互動交際的情境就隨即啟動，在這裡基模所可能動員的類目包括當下時空情境（the current setting）、相關社會認同、新增知識、相關社會文化知識、社會態度與意識形態、意圖、情感、媒體內部的組織制約等，而這些與脈絡相關的類目（context-relevant categories），即是透過基模將其編組起來形成特定論述（van Dijk, 2008, pp. 101-106）。而論述做為一種「結果」（consequences），可以透過分析的手段，將構成論述的相關類目再重建出來（van Dijk, p. 108）。

叁、論述、種族主義與意識型態研究

早在一九八〇年代末期，van Dijk 就對種族偏見的議題存有學術興趣，認為它是一個在主流社會日常言談中每天都在複製的東西（van Dijk, 1987），一九九〇年代以後他逐步將關注焦點大幅轉移到種族主義的問題上。儘管 van Dijk 曾透過不少論述梳理意識形態與批判論述分析的關係，但在實例探討上，van Dijk 既未選擇傳統左翼陣營所關注的社會階級議題，亦未選擇當代文化研究論者所特別關注的認同議題或性別議題，而是西方社會內部的種族主義（racism）議題。按照他自己的說法，這是緣於他在墨西哥任教的經歷，使得他開始注意到種族歧視的問題，回到荷蘭後他又特別注意到主流社會精英如何討論外來移民與少數族裔的議題，於是整個研究重心轉到了種族主義、種族歧視等議題。特別是致力研究新聞媒體在塑造種族主義上所扮演的角色，透過對英國與荷蘭數以千計新聞報導的定質與定量的分析，發現不少日常言談中的種族偏見，瀰漫在報紙相關主題的報導中，如視移民與難民為寄人籬下

的食客，會帶來犯罪、暴力、文化污染等（van Dijk, 1987）。接下來 van Dijk 更將注意力從報導轉移到了報紙的意見與評論，探究精英在塑造種族主義上所扮演的角色，陸續出版了包括《種族主義與報紙》（*Racism and the Press*; van Dijk, 1991a）、《精英論述與種族主義》（*Elite Discourse and Racism*; van Dijk, 1993a）等著作。

伴隨著對種族主義的研究，van Dijk 也將他的學術興趣，拓展到意識形態理論的開發上。van Dijk 在 1998 年出版了他的《意識型態：一個跨學科的途徑》（*Ideology: 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正式為如何研究語言文本中的意識型態，提出他所謂「認知／社會／論述」的分析架構。他認為「意識型態」是一種社會認知的形式，也是一種集團的社會再現（social representation）基礎。它基本上是藉由社會實踐，特別是「論述」所再生產出來的。van Dijk 所關注的即是這個意識形態被「再生產」的過程，以及文本與言談如何介入這個再生產的過程。特別是，論述如何再生產支配與社會不平等的系統（例如種族主義），在這裡所謂「再生產」（reproduction），如同生物物種的延續或複製一樣，意識形態也會主動的延續與複製，文化、階級乃至整個社會系統亦復如是。van Dijk 認為更重要的是社會成員本身亦主動積極參與這個過程，他們的參與使得社會結構或文化規範得以維繫或延續，而 van Dijk 認為用以考察這種「再生產」的分析架構即是批判論述分析（van Dijk, 1993a, pp. 25-26）。

意識型態的定義非常多，而 van Dijk 所選擇的定義比較接近當代社會心理學家 Martin Seliger 的觀點，認為所謂意識型態是「一種信仰系統的類型」（a type of belief system; Seliger, 1976）。van Dijk 認為選擇這個定義，就可以完全透過認知的術語來討論意識型態的特徵，避免將焦點轉移到社會實踐、社會結構的層面上去討論（van Dijk, 2000, p.

94)。這顯然與傳統研究意識型態的途徑有很大的出入，van Dijk 自己也承認他對意識型態的討論，與廣義的社會學、政治經濟學與哲學途徑處理方式相當的不同，他並不接受馬克斯觀點的意識形態理論，特別是「虛假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的討論，直指其是一個相當含混的字眼。所以他選擇的是一個建基於社會認知理論的意識型態理論，意識型態在這裡被界定為一種主流社會團體所共享的心靈再現（知識、態度；Schaffner & Kelly-Holmes, 1996, p. 48; van Dijk, 2000, p. 93）。

在政治意識形態的研究上，「種族主義」主要是主張人類因為在種族上的差異，所反映在文化、智識與道德上差異的一組理念，如宣揚白人種族至上的「雅利安主義」（Aryanism）、「反猶主義」（ant-Semitism）等。英國政治學者 Andrew Heywood 曾在他所著《政治學的關鍵概念》（*Key Concepts in Politics*）一書認為，在學術研究上，種族主義還可能用來指謂包括非蓄意歧視、對少數族群的價值與文化無動於衷、對種族差異的刻板印象、刻意藉種族差異操作政策手段等（Heywood, 2000／蘇子喬譯，2009，頁 72）。從 van Dijk 關注的議題內容看來，他討論的「種族主義」很接近 Heywood 的「非蓄意歧視」；換言之，van Dijk 特別感到興趣的部分主要是對隱藏在政治或媒體論述的字裡行間、人們習而不察的各種種族偏見或敵意，而他提出的批判論述分析，正是要將這些帶有種族主義的意識形態從語言文本中挖掘或提煉出來。這其中，van Dijk 對精英的論述更有興趣，特別是在種族主義議題的立場上，大部分的精英都聲稱反對種族主義，但 van Dijk 認為一個人策略性的「當然反對種族主義」，與一貫支持反種族主義的立場存在著關鍵的區別；他認為將精英劃分為種族主義者或是非種族主義者沒有什麼理論意義與政治意義（van Dijk, 1993a, p. 19）。換言之，van Dijk 認為只要精英族群持續維持族群偏見並時常出現歧視行為，那

麼種族主義的再生產就會一直持續（van Dijk, 1993a, p. 26）。

對 van Dijk 而言，研究當代種族主義最主要的理論旨趣，在於任何形式的種族壓迫或剝削，在當代民主國家的憲法或法律中早已被界定為「非法」，且任何形式的種族歧視或偏見，在西方社會也都被視為是違反人權平等的理念，甚至「種族主義者」已經是一種帶有負面意涵的指控，在這樣的前提下以任何形式去倡議或表達種族主義都會被非議。但究其實，在西方社會實存經驗中種族歧視或偏見的現象並未真正消失，只是以一種更隱諱、更迂迴的方式，隱藏在日常的語言與文本中。而這其中居精英階層的優勢族群更有意識的藉由語言修辭的操作，表達他們看似價值中立的種族主義論述。van Dijk 在研究歐美諸國國會議場針對族群議題進行辯論時，就發現政治精英運用了不少表達策略，來呈現他們對種族議題的論述。例如不斷強調自己國家如何的尊重人權，如何盡心維護少數族群的權益，再巧妙的藉由負面的包裝，來醜化那些外來的「他者」，如「非法移民」、「經濟難民」、「外籍新娘」等，卻又公開表態反對或拒絕種族主義（denial of racism），甚至刻意強調應同情弱勢或外來族群並給予公平對待等（van Dijk, 1997a, pp. 36-38）。

同時，van Dijk 也發現，相較於其他擁有權力的精英團體，如政客、企業主或專業人士等，媒體精英在主導意識形態再生產上的影響力最大（van Dijk, 2000, p. 36）。這種影響力在處理種族主義議題時更是明顯。van Dijk 認為最主要原因在於主流社會的閱聽大眾一般而言在日常生活上很少會有與少數族裔互動的經驗，也很少有機會接觸少數族裔的資訊，這使得媒體有很大的空間得以主導少數族裔議題的主題選擇與報導方向，如果少數族裔的議題很少被主流社會關注，再加上少數族裔又沒有自己發聲的管道，那麼媒體精英幾乎就可以全面主導少數族群的再現（van Dijk, 2000, p. 37）。

也因為這樣，在研究材料的選擇上，van Dijk 特別喜歡從媒體與官方文書取材。媒體部分主要是報紙所涉及族群議題的報導與評論，官方文書則是涉及少數族群政策辯論的國會記錄，特別是議員之間的言辭攻防。van Dijk 會特別挑選這類素材的原因，在於這些文本都是「正式記錄」（for the record），報紙媒體的文字，不論是報導或評論，在出版前都經過負責守門的編輯處理過；同樣的，國會記錄的內容在出版前也一定經過嚴格的潤飾過。畢竟當代所有民主國家都會立法禁止族群剝削或歧視，而在社會觀念上，被認為「有族群歧視或偏見」也是很嚴重的指控。因而西方媒體或議會，不論是在處理類似族群爭議或政策等敏感議題時一定會格外慎重，避免觸碰任何法律、道德與政治正確的爭議，若干會引發少數族群激烈反彈字眼一定會被過濾處理掉，以免被扣上「歧視」或「偏見」的指控（van Dijk, 1997a, pp. 35-36）。在這樣層層把關的限制下，van Dijk 認為還是能從其中尋覓出「種族主義」論述。

不只媒體與官方文書，這種以迂迴、隱諱方式呈現種族主義的論述策略也同樣會出現在知識與文化的論述中。van Dijk 在對美國當代新右翼評論家 Dinesh D'souza 在 1995 年出版的《種族主義的終結：多種族社會的原理》（*The End of Racism: Principles for A Multiracial Society*）一書進行分析後發現，當代討論種族主義的論述策略之一即是先透過指控、甚至譴責種族主義來取得論述位置的正當性，先藉此巧妙掩飾了自己真正的種族主義立場，然後再將真實立場藉由學術或文化的語言加以包裝迂迴、間接的傳達出來。例如，事先聲稱自己是「反種族主義者」（anti-racist），或是刻意將種族主義的定義限定為是對「種族存有先天、優劣差異的信仰」（belief in intrinsic, biological based superiority; van Dijk, 1998b, p. 293）。由於這種「種族優越論」的論述在當代知識、文化或政治論述中老早就已消失，要對這種「人人都會反對」的論

述予以批判並劃清界限本來就不困難，藉著這種論述策略擺脫「種族主義者」的指控後，就可順勢將自己真實的種族主義立場以狀似中立的語言表達出來。就像 D'souza 的著作一樣，明明是在倡議白種人文明的優越性，也明明是在批判黑人文化對美國文明的挑戰與威脅，卻將書名標示為《種族主義的終結》，明明在書中到處瀰漫西方文化優越的論述，卻又一再聲稱其反對與批判種族主義的立場，這一點或許是 van Dijk 對當代種族主義研究上的最大貢獻。

肆、在論述中搜尋意識形態：從若干實例分析檢視 van Dijk 的分析策略

在 van Dijk 看來，大多數人都是透過文本或日常言談來表達或再生產其意識形態，所謂文本與言談在這裡指的就是一種「論述」，而批判論述分析正就是要從這些離散的文本與言談中搜尋隱藏在其間的意識形態，亦就是檢視意識形態是如何藉由論述來加以表達與再生產（van Dijk, 1998b, p. 5）。而在實際操作上，不論 van Dijk 曾透過如何繁複的心理學語言處理他的分析架構，這個生產論述的心靈模型終究是無從觀察的。換言之，不論這個論述生產的過程有多複雜，唯一能具體掌握且是「可觀察」的部分，就只有現成的語言文本，亦就是一組論述。而要解讀論述，進行所謂的批判論述分析，勢必得從現成的文本或言談（亦就是論述）出發，並依不同層次（總體、微體）、不同語言學元素（語法、語意、語音、語用等）逐項加以拆解檢視，追尋論述者如何將這些元素組裝生產出來。換言之，按照 van Dijk 的觀點，「論述」若是做為一種結果，那麼「批判論述分析」就是從這個結果逆推回去，將所有參與生產這個「論述」的語言學類目加以拆解，逐一解讀，追問其背後的

局部與整體意義，進而發掘隱藏在其中的意識形態。

先談「社會認知」的部分。在 van Dijk 看來，做為一種不可觀察的心靈模型，不論是知識、信仰亦或是態度等，如果必須是從可觀察的文本或言談逆推出來，那麼這個被推斷引申出的心靈模型，當然是以文本中所提供的「線索」加以引申的。例如，van Dijk 在分析英國傾向保守黨的刊物《周日通訊》（*The Sunday Telegraph*）的社論時，曾特別選擇在 2004 年 8 月 8 日所刊出的一篇題為〈左傾化報紙〉（*Pinko Paper*）的文章加以說明。這篇社論主要是在批判英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的左傾，文中指出一家偏左翼的智庫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所發佈的一項研究報告，指出英國的貧富差距正在擴大，這篇報告引起許多左傾論者盲目跟進論述並不令人意外，但何以《金融時報》也要跟進擴大報導呢？其中有一段文字指出：「但在英國有一家報紙堅決呼應這個主張，還打上『英國財富不均的嚴重化值得憂慮』的標題，這家報紙不是晨星報（*Morning Star*），而是金融時報。事實上，不出意料的是，金融時報在過去幾年的政治觀點越來越紅，也難怪他們會在 1992 年選擇支持 Neil Kinnock」（van Dijk, 2007, p. 130），這篇評論的主要是批評原本理應是右傾的《金融時報》竟然越來越左傾，顯然社論作者認為這家報紙已經從「我群」倒向「他群」那一端了。van Dijk 認為作者已經預期他的讀者早就知曉《周日通訊》是傾向英國保守黨的刊物，也都知道《金融時報》理應是歸類為右傾支持市場自由主義的報紙，而《晨星報》則是英國共產黨辦的報紙，Neil Kinnock 是在 1992 年代表工黨出馬競選的黨魁，但這些相關的知識與立場觀點等在社論中通通都沒有交待，但作者顯然認為讀者一定都會循共享的「社會認知」加以理解，而研究者在分析時亦是同樣也可循這些關鍵詞語背後的脈絡加以引伸。

至於論述中不同層次的語言學單元如何再現意識型態（特別是種族

主義)呢? van Dijk 提示其中的關鍵在於如何再現自我 (self) 與他者 (others), 亦就是當論述一旦涉及到處理我們 (Us) 與他們 (Them) 的論述時, 立即就會啟動一組集體的基模 (group schemata) 對其加以識別, 如涉及自我群體的再現時所啟動的類目就包括如下:

成員的資格 (membership): 誰屬於我們? 誰可以被認可是屬於我們?

作為 (activities): 我們要做什麼?

目標 (goals): 我們為何要這樣做?

價值 (values): 我們何以應該這樣做?

位置 (position): 我們位在何處? 與他者團體的關係是什麼?

資源 (resources): 我們擁有些什麼? 我們又缺少些什麼?

例如, 在論述到「記者」這個角色時, 被啟動的意識型態類目就包括他所屬媒體的身份、他所撰寫的新聞稿、他是否履行守望者的功能、他是否謹守客觀公正的專業倫理、他是否尊重閱聽眾、他是否掌握第一手訊息等。而這些類目正就是 van Dijk 所指「脈絡化過程」中的知識, 只不過這種再現由於涉及社會集體認同的建構, 乃至集體利益的衝突, 所以在涉及他者群體時, 通常都是帶有偏見 (biased) 的, 也通常都是以兩極化的形式呈現的 (van Dijk, 1998a, p. 25)。

爲了從語言文本中搜尋出這種藉「兩極化策略」(strategy of polarization) 所呈現的種族主義論述, van Dijk 特別提出一種「意識形態方陣」(ideological square) 的分析策略, 亦就是在觸及族群議題時, 藉由一種「歸類」所形成的「功能移動」(functional moves), 有效的將「我們」與「他們」予以區分並加以對立, 其中特別是針對我群 (in-group) 的讚揚以及對異己 (out-group) 的貶抑 (van Dijk, 1998a, p. 33)。在 van Dijk 看來, 意識形態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一個團體的自我歸

類的基模（self-schema），將某些團體所集體認同的特徵予以類目化（categorize），如目標、規範、集體行為等，再透過歸類的方式將社會中的人們予以區分並對立，這種分類可以劃分成下面四個方陣（van Dijk, 1998a, p. 33）：

- 一、著重強調我們正面的品質（properties）／行為（actions）
- 二、著重強調他們負面的品質（properties）／行為（actions）
- 三、儘量淡化我們負面的品質（properties）／行為（actions）
- 四、儘量淡化他們正面的品質（properties）／行為（actions）

在《意識型態：一個跨學科的途徑》一書中，van Dijk 進一步再將這種原本只針對我群與他者加以歸類的意識形態方陣擴張到所有資訊的傳遞上（van Dijk, 1998b, p. 297）：

- 一、表達／強調有利我們的正面資訊。
- 二、表達／強調不利他們的負面資訊。
- 三、壓制／淡化有利他們的正面資訊。
- 四、壓制／淡化不利我們的負面資訊。

這種「意識形態方陣」的分析策略在處理種族主義論述時之所以有效，在於絕大多數涉及種族主義的論述文本都會事先聲明「反對種族主義」，同時聲稱絕對擁護種族平等的價值，然後再以間接或迂迴的方式傳達對少數族群或族群關係負面的資訊或觀點。van Dijk 認為這類型的論述提供了不少強調或淡化某些「意義」的方式，許多會呈現意識形態意涵的論述經常不是說得太少，而是扯進太多不相關的事物，例如不經意地貼上若干負面標籤等（van Dijk, 1991b, p. 114）。van Dijk 運用此一意識形態方陣來分析媒體文本中不同層次中的「意義」，包括命題結構、語句語法、論述形式、修辭等。這中間最能直接表達論述中的意識形態即是論述的語意學。它的相關面向包括主題選擇、描述層次、意涵

與預設、局部連繫等，而針對這些面向的語意分析，包括檢視其在不同層次與向度上對語言學元素的選擇等，都能發揮其在意識形態上的功能。

在檢視歐洲幾個國家議會針對種族議題進行辯論的議事記錄時，van Dijk 就發現這種「積極彰顯自我，迂迴貶抑他者」的論述策略經常在涉及種族議題的文本中交錯的出現。例如德國聯邦議會在討論《外僑法》時，就有議員先藉機頌揚德國的寬容與民主，聲稱「我知道，地球上沒有一個國家像我們國家這部法案一樣重視定居外國人的權利」；再例如法國議員在辯論族群政策時，就會事先就聲明「反對種族主義」，聲稱「法國現今，據全球各地經常來我們國家避難的人士表示，是世上種族主義最少的國家。我們不能容忍聽見說法國是個種族主義的國家」。然而在觸及外來移民議題，即便是負面的政治論述，也一定是間接而迂迴的，例如英國下議院有議員在論及移民時表示「縱使明天終止所有的移民進入，我們的國家在另一個二十五年裡會是怎樣呢？對我們宗教、道德、習俗、習慣等的影響是什麼呢？在穆斯林的部分社區中，已經爆發了一些危險的情況」（van Dijk, 1993a, pp. 72-91）。

透過意識形態方陣搜尋出涉及種族主義的文本後，接下來就是處理「主題選擇」的分析。在 van Dijk 的架構中，「主題的選擇」（topic selection）即是他所謂的總體語意學，有時也被稱為語意總體結構（semantic macrostructure），所處理的是「文本整體所述說的究竟是什麼」的問題，即是所謂的主題（the main topic）為何的問題。它一方面探究如何從文本中藉諸刪除、化約、普遍化、與重組的手段，讓主題結構得以浮現。另一方面則是探究此一主題結構是如何以不同比重配置在文本中，包括檢視其如何被理解、那些重點被突出、相關性又如何被呈現等。這兩者所處理的正是主題結構的生產與理解的課題。van Dijk 認

為主導文本中主題結構得以浮現，以及其在文本中配置的，就是一組特定的知識、信仰、態度、與意識型態的運作。以新聞論述為例，其中的主題結構，van Dijk 認為就是標題、導言與各段落的起始句，它們依主題焦點的輕重緩急、時間順序的遠近先後，由上而下（top-to-bottom）的線型方式配置在新聞文本中。而關乎此一特定新聞內容的社會文化脈絡，如意識型態等，主導了標題的製作與導言的寫作。van Dijk 認為當一則新聞被書寫之際，與此新聞有關的一組社會知識與社會信仰隨即被啟動，它驅使記者與編者引申出所有主題結構，並決定何者置於標題、何者作為導言、何者又配於稍後各段落的起始句中。這些步驟明顯是以認知術語描述的（van Dijk, 1988a, pp. 82-83）。

van Dijk 在分析歐洲媒體中有關種族議題的報導與評論時即發現，媒體精英最感興趣的幾個刻板主題，多半集中以下幾個主題：一是外來移民（特別是非法的，數量龐大的）；二是族群化的犯罪，特別是涉及暴力的犯罪；三是文化差異，特別是文化異常（cultural deviance）；第四則是族群關係，特別是涉及歧視或偏見等，van Dijk 認為透過這些主流媒體主題化（topicalization）的操作，族群與族群關係也因此被定義（van Dijk, 1993a, pp. 248-245）。van Dijk 在 2005 年出版的《西班牙與拉丁美洲的種族主義與論述》（*Racism and Discourse in Spain and Latin America*）一書中討論種族主義內涵時，就認為種族主義不只是一套信念或一組論述，它還是一種支配（domination）、一種歧視（discrimination）、一種透過政治、媒體或教育學術機制所操作出的制度（institution）。在這個討論基礎上，van Dijk 從西班牙與拉丁美洲多個國家的媒體報導及議會議事記錄中挑出了許多文本進行分析，而其所採取的分析策略，即是示範只採用總體層面的「主題選擇分析」，對文本中語句的處理，僅只追問其是代表那個主題。他在分析西班牙媒體處

理新移民議題時就發現，某些主題頻繁出現的程度，幾乎已經可以形容成是所謂「永恆」（permanent）的主題了。這其中特別是來自北非摩洛哥非法移民的報導，可以說是一面倒的集中在偷渡、非法打工、邊界管制等「主題」上（van Dijk, 2005, pp. 35-37）。

檢視完「主題選擇」之後，再就是「局部語意分析」（local semantic analysis）的層次，分析單元主要是論述中的個別命題。可以說在實際操作上，van Dijk 理論架構絕大部分的分析落點，都是集中在命題（propositions）上，甚至可以說 van Dijk 的分析策略就是建立在以「命題」為基本分析單元的基礎上，因而英國拉夫堡（Loughborough）大學的學者 Michael Billig 曾將 van Dijk 的分析架構形容是一種「命題化的途徑」（propositional approaches; Billig, 1996, p. 54）。這種途徑處理意識形態的方式，主要是將文本中構成論述的一組命題，區分為事實型命題（factual propositions）與評價型命題（evaluative propositions），前者反映所動員的知識，後者則反應所表達的意見，不論是何者，都是透過語言學的特徵（linguistic features）所賦予的。而 van Dijk 認為這組語言可以與外在的社會實踐，以及內在的心理學以一種秩序化的方式連結起來。在這裡，待分析的論述結構，一方面受到外環境總體脈絡的社會實踐制，另一方面則是循隱藏在個體內在心靈結構所再生產出來的（van Dijk, 1996, pp. 18-19）。而個別命題在 van Dijk 分析架構中的重要性，從 van Dijk 多篇針對種族主義的個案研究即不難發現，最明顯的處理方式，是 van Dijk 通常會將他認為有意識形態意涵的句子挑出來，再加以編號後才進行分析。

為了發掘隱藏在個別命題中的意識形態，在分析策略上，主要是檢視個別字彙與語句的策略性意義（strategic meaning）、功能以及語句間的關連。同時也檢視其意義背後相關修辭與風格（stylistic）的操作。策

略性意義的檢視主要是探究文本中隱而不顯的意涵（implication），它多半要從字句中引申出來，如意有他指的預設（presupposition）、模糊焦點的含混（vagueness）、提供過多或不相干資訊的過度表述（over completeness）等（van Dijk, 1993a, pp. 255-262）。功能的檢視則主要是探究是否有語句存有「語意上的移動」（semantic moves），以刻意經營自我正面的形象，例如刻意否認自己是特定意識型態的支持者（denial），刻意以平衡報導來達到緩和（mitigation）的效果等，特別是若干有清楚立場的報紙媒體，往往就透過一些 van Dijk 所指的「語意上的移動」，來顯示其表面公正客觀的形象（van Dijk, 1995a, pp. 259-263）。

語句間的關連則主要是檢視其是否符合意義上的「局部連貫」（local coherence），亦即一組命題之間，是否可依時間、條件、原因、或次序上的彼此關連，而形成彼此意義上的扣連。van Dijk 認為許多語句間能夠連結扣連，經常是預設讀者已經知道它背後所有的社會知識，能夠對命題之間形成「隱而未現的銜接橋樑」，因而 van Dijk 認為這種扣連非常主觀，也受意識型態的影響（van Dijk, 1991a, p. 161）。

「局部連貫」的分析策略在處理種族主義文本上之所以重要，在於當精英運用「當然反對種族主義」的修辭策略時，可以用來辨別其陳述究竟是真的還是假的。如果真的是「反對種族主義」，那麼辭彙與語句之間，乃至語句與語句之間必須題上下文彼此連貫的，而且是有證據支持的（consistent, across contexts, and backed up with arguments），否則很可能僅只是表面上消極的反對種族主義，實際上卻是傳遞對少數族群或族群關係負面的觀點或證據（van Dijk, 1993a, p. 65）。

例如在辭彙與修辭的選擇上，van Dijk 就發現媒體在報導少數族群群眾聚集表達抗爭訴求時，會刻意選擇「暴民」（mob）、「煽動份

子」(rentamob)等字眼，而不用「群眾」(crowd)、「示威者」(demonstrators)的字眼來貶低其身份；而處理群眾的行為經常會使用「狂吠」(howling)、「尖叫」(screaming)、「憤怒」(fury)的字眼，而不會使用「生氣蓬勃」(vigorously)、「抗議」(protesting)的字眼(van Dijk, 1991b, p. 116)。van Dijk 曾選擇 1997 年 3 月 5 日在英國下議院針對尋求庇護的移民對英國鄉鎮的影響所進行的一場議會辯論做為分析素材(van Dijk, 2000, pp. 101-113)。van Dijk 選擇的是保守黨女議員 Tresa Gorman 與工黨議員 Jeremy Corbyn 在議場的發言紀錄，挑選出兩名議員發言內容中與主題相關的命題，這其中在局部語意分析上 van Dijk 就發現反對開放移民的保守黨議員就先透過界定(define)與類目化(categorise)的策略將外來移民予以負面標籤化，例如先將申請庇護者(asylum seekers)區分為真正的(genuine)與偽裝的(bogus)兩種，然後再藉由意識形態方陣的策略，一方面透過正面的語詞強調英國是如何立法保障那些真正的庇護申請者，另一方面則是刻意藉由負面的語詞，突出偽裝者的負面形象，例如強調真正的庇護申請者之權益是如何受到那些偽裝者的傷害與影響，進一步再強調這些對偽裝者對英國政府所造成的重大財政赤字，以及對英國納稅人的龐大負擔等(van Dijk, 2000, p. 104)。

2000 年以後，van Dijk 在實例討論上開始納入更多語用學的分析策略，開始關注原本在分析操作上較被忽略的脈絡(context)層面，亦即是除了追問文本與言談本身的意義之外，還要追問其會受到社會情境怎樣的影響。在 van Dijk 看來，社會對論述的影響並不是直接的，主要還是要看語言使用者如何界定溝通的情境，這正是語用學的角度。在 2009 年所出版的《社會與論述：社會脈絡如何影響文本與言談》(*Society and Discourse: How Social Contexts Influence Text and Talk*)一

書中，van Dijk 挑選的個案是英國首相布萊爾在 2003 年 3 月 18 日在下議院就英國是否應參與攻打伊拉克的政策，與在野黨展開辯論的演說內容，van Dijk 在分析中，完全不再使用微觀的語言學分析，而是以「政治認同」（political identity）作為一個總體層次的脈絡，檢視其如何主導他政策論述的鋪陳。藉由這篇講稿，van Dijk 檢視布萊爾如何靈活運用他所同時具有的英國首相、執政黨領袖、多數黨議員、代表支持參戰民意領袖等多重身份，不斷的就英國國族認同、多數黨認同、多數民意認同、民主價值認同、國際和平認同等進行召喚，這種不同身份、不同認同在講稿中不斷的游移，做為被召喚的主體，如英國、工黨、下議院、歐盟、美國、聯合國、人民、軍隊、我們等詞語的交替使用，也正是反映這種認同召喚的移動（van Dijk, 2009, p. 247）。

伍、van Dijk 的理論定位與問題

檢視過 van Dijk 的理論基設與分析策略後，當然有必要針對其理論觀點的定位與疑義做進一步的討論，這是研究者考量採用其途徑前的必要動作。比較有趣的地方也是在這裡：不論是媒體研究、文化研究，甚至是批判論述分析學術社群本身，針對 van Dijk 理論觀點進行評述的文獻都相當稀少。許多梳理當代媒體或文化研究理論的著作，幾乎都不觸及對 van Dijk 的討論，這個學術論述上的「留白」讓研究者嘗試為 van Dijk 做理論定位時增加了不少難度。

可以說，不論 van Dijk 為媒體文本的分析途徑提供了怎樣的學術開發，西方的傳播與文化研究學界都很少評述其理論。一般探討或引介不同媒體理論與途徑的學術著作，只要是涉及文本、論述分析、意識形態等課題的章節所梳理的多半是偏向後結構主義脈絡的理論文獻（如 M.

Foucault & S. Hall 等的理論），對 van Dijk 多半是不置一辭。以台灣傳播學界最熟悉，著作最常被當作傳播理論教科書的 Denis McQuail 為例，他與 van Dijk 有很長一段時間同時都在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任教，只不過是所屬學院不同，但 McQuail 在他 1994 年所出版的代表著作《傳播理論導論》（*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 An Introduction*）一書中對這位在同一學校任教的同仁，同時也在分析傳播內容上提供過重要觀點的學者，僅只在討論少數民族傳播時附帶提及，而且完全只是點到為止（McQuail, 1994, p. 240, 255, 262）；甚至在索引中雖出現「論述分析」的條目，但在實際章節中卻完全沒有出現。更有趣的是 McQuail 在 2000 年出版他的「McQuail 的傳播理論」一書，在書末的專門術語（glossary）釋義中特別新納入「論述分析」這個條目（McQuail, 2000, p. 554），所提供的定義也非常接近 van Dijk 的觀點，而且參考書目中還列上了三本 van Dijk 的著作，這證明 McQuail 是有接觸過 van Dijk 的著作，但全書中卻隻字未提。不論這是有意的忽略亦或是刻意保留，都是相當可惜的事，畢竟 McQuail 花了很大的功夫將當代所有的傳播理論與途徑納入了他所編製的特殊類型中，他會怎麼處理 van Dijk 對新聞文本所提供的分析策略，當然值得期待，問題是他卻選擇了「存而不論」，也讓這場令人期待的學術對話留下了空白。

儘管學術文獻中對 van Dijk 進行評論的並不多，但要為其理論架構做定位還是有其必要。由於 van Dijk 是語言學出身，若要從理論系譜上為其定位或許可以從語言學的系譜上去檢視。而從 van Dijk 理論架構中所動員的語言理論系譜加以檢視，研究者或許不難發現 van Dijk 的分析策略所採取的語言學立場，有大半是屬於分析哲學領域的，這一點也使他的分析策略與其它的文本分析策略出現明顯的區隔。van Dijk 在多本著作中所提示的分析架構中，曾數度納入分析哲學領域中的語言分析進

路，如語意學（semantics）、語法學（syntax）、語用學（pragmatics）等，這幾種分析策略正是分析哲學的核心，也是在為 van Dijk 分析策略做定位時所不能忽略的關鍵。但如果再進一步考察，就不難發現 van Dijk 在實際操作這些分析策略時也有他的「比例原則」。

在不同語言單元分析的進路中，van Dijk 使用最少的是語法學。儘管在交待分析架構時，van Dijk 一定會列上語法學，但在實際分析操作上，van Dijk 幾乎不處理語法學的向度。有趣的地方也是在這裡，在批判論述分析學術社群的先驅倡議者中，Roger Fowler 正就是透過語法學的向度來處理語言文本中的意識型態，在他 1971 年所出版《新聞中的語言：報紙之論述與意識型態》（*Language in the News: Discourse and Ideology in the Press*）一書中，即完全透過語法層面的分析來詮釋語言文本中的意識形態，認為語言論述中的語法係言說者根據不同社會情境下於不同選項（options）中所為抉擇（selection），每組選項都蘊含不同意義，而針對這些選項所為的抉擇，有其意識型態上的意義（Fowler, 1991, p. 190）。Fowler 在他的著作中提示了幾種重要的分析策略，如及物性分析（transitivity analysis）、句法轉換、詞彙結構分析（lexical structure analysis）、模態（modality）分析、言語行動分析（speech acts）分析等。例如，及物性分析是以語句中動詞體系所表示的過程為核心，檢視文本中各個句子所選定的動詞究竟是屬於何種類型，同時也檢視各個參與者（participant）所涉入的是何種類型的情境（circumstance）；Fowler 認為這種針對動詞類型的選定，是有意識型態意涵的（Fowler, 1991, p. 73）。這個從語言文本中所使用的語法來提煉其中所隱藏意識型態的分析策略，幾乎影響了批判論述分析學派中的大部分學者（特別是 Norman Fairclough），而 van Dijk 對他的觀點卻很少引述，甚至完全不置一詞，這是在檢視 van Dijk 的分析策略中非常耐

人尋味的地方。

相較於語法學分析，van Dijk 將他的分析策略絕大部分放在語意學分析上。做為一種研究語文表達（linguistic expression）在什麼條件下才有意義的學問，語意學分析主要在探討如何從語詞、語句、篇章等語言學單位的成分（feature）或指謂（reference）等項目的檢視中獲得正確的意義，亦就是達成語言符號與真實意義之間的一致與對應（correspondence of meaning）。這裡對語意學分析策略的強調，或許是 van Dijk 在批判論述分析操作上與其它途徑上最大的差別。也可以說，不論 van Dijk 如何繁複的論證社會認知、論述結構、脈絡模型乃至意識形態之間盤根錯節的關聯，只要進入實例的探討，van Dijk 主要分析策略都不脫語意學的範圍。對 van Dijk 而言，就特定文本進行批判論述分析亦就是追問文本中有那些語言學要素應該被刻意挑選出來，這個追問的過程，其實就是追問特定語言文本「說了什麼？」，這個追問「意義」（meaning）的活動，正是語意學的工作。也因為這樣，語意學的分析策略可以說是 van Dijk 理論架構最核心的一環。

作為分析策略的核心，van Dijk 分析架構中最常列入的主要是局部語意學（local semantics）與總體語意學（macro semantics），前者主要是處理字詞與特定語句命題的意義，後者則是處理整個段落的整體意義（類似新聞標題）。van Dijk 在 1995 年曾發表的一篇期刊論文「論述語意學與意識形態」（Discourse semantics and ideology）中，甚至將他在實際分析操作中最常列出的語言學分析單元，包括主題、焦點、命題結構、局部連貫、描述層次（level of description）、意涵（implication）與總體結構等一概統稱為論述的語意結構（semantic structures of discourse）。而 van Dijk 認為分析者的工作就是檢視這些語言學單位如何受到意識形態所操控（van Dijk, 1995a, p. 243）。換言

之，van Dijk 的分析策略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透過語意學分析的步驟，從一組論述中搜尋屬於意識形態的語句或段落，再解析其意義。

除了語意學之外，前面提過在 2000 年以後所出版的著作中，van Dijk 也開始加重語用學分析的份量。這個分析策略強調語言文本的指涉意義，不全然是受到語言的形式內容所決定，更多是受到語言表達時所處的情況和環境所決定，亦就是脈絡（context）。這個脈絡提供了言談或文本若干理所當然的知識，做為互動溝通的共同基礎。van Dijk 處理脈絡最代表的著作包括 2008 年所出版的《論述與脈絡：一個社會認知途徑》（*Discourse and Context: A Sociocognitive Approach*），以及 2009 年所出版的《社會脈絡如何影響文本與言談》（*Society and Discourse: How Social Contexts Influence Text and Talk*），這兩部著作讓 van Dijk 的分析策略從 2000 年以後帶有更多語用學的分析色彩。換言之，在處理論述生產與理解時，更強調語言使用者如何界定他們所處的溝通情境，而社會結構提示的情境，又如何決定這些論述的生產與理解。

van Dijk 在其理論架構中納入語意學與語用學的分析策略，在為 van Dijk 的理論進行定位上非常重要。因為這不僅是區隔 van Dijk 與其它文本分析策略（特別是文化研究）的關鍵，也是顯示 van Dijk 與批判論述分析學派其它倡議者在立論上差異的關鍵。做為 van Dijk 理論核心的語意學與語用學，對語言文本的解讀基本上是隸屬分析哲學的傳統。以語意學分析中最核心的語意三角（semantic triangle）為例，所謂的符號（symbol）、概念（concept）與指涉物（referent），基本上可以上溯及美國符號學者 Charles S. Pierce 的符號學（semiotics）理論，這個傳統強調符號所指涉的客體（object），以及特定符號解釋者的時空脈絡性；這種對符號進行解釋的策略，與盛行於歐陸的另一支也叫做符號學（semiology）的傳統大異其趣，這支符號學傳統可以上溯及瑞士語言學

者 Ferdinand de Saussure，將符號的組成區分成物質層的「能指／符號具」（signifier）以及意義層的「所指／符號義」（signified），而指稱（signification）就是將能指與所指結合在一起產生意義的過程，這個符號學的傳統也影響了稍後歐洲文化研究的學術社群。區隔這兩種符號學傳統的關鍵，除了其二元與三元的構成差異外，最主要的是 Pierce 的符號學強調被指涉客體的在場（present），而 Saussure 的符號學則是強調能指與所指之間武斷或約定俗成的連結，並不需要被指涉的客體在場，亦就是所謂的不在場（absent），這種差異在梳理兩種符號學傳統的差異上非常重要。換言之，van Dijk 與其它類型的文本或論述分析策略的最大差異，是他認為所有待分析的語言文本，確實反映了經驗世界的實存現象，而其它處理文本的文化研究途徑卻是要切斷這種與實存世界的連結，僅只關注語言文本如何建構實存的真實。

換一個角度說，在處理語言與真實關係的立場上，受後結構主義思潮影響甚深的文本或論述研究途徑，在詮釋文本或論述的意義時不僅與作者分離、甚至與所有外在的真實分離，文本擁有自己生命，缺乏外在結構本身的任何參照，而在這裡文本再生產一切外在真實的任何宣稱都已經遭到破壞（Alvesson & Skoldberg, 2000／施盈廷、劉忠博、張時健譯，2011，頁 12-13）；這種論點恰好是與 van Dijk 的主張相反，在 van Dijk 看來，意識形態是一種社會集團的「社會再現」形式，這種形式可以透過語言論述再生產出來，在語言與真實的關係上，這正是所謂語言可以反映真實的「鏡射再現觀」。在這種立場下，van Dijk 會選擇語意學與語用學的分析策略，也就不令人意外了。

談到這裡，或許也可以理解，van Dijk 在處理意識形態的主題上，何以與其他同樣也在處理意識形態的學派相比，在討論風格上有那麼大的差異。畢竟分析哲學在處理意識形態的課題上，本來就是企圖透過日

常語言中的概念、命題與論證的細緻分析，來檢查涉及意識形態語言中所存有的含混、歧義、名實不符、與不當推論的偏見等，在這裡意識形態被認為是隱藏在日常語言中，可以藉由語法學、語意學與語用學的分析來加以發現的。相對的文化研究乃至偏後結構主義立場的學派，則是將意識形態的文本視為一組語言符號組合而成的能指（符號具），它是一種具有實踐與規制作用的實存，對其進行分析亦就是檢視這一組意識形態的論述是如何建構社會、建構認同乃至建構權力。而 van Dijk 的分析策略很明顯就是接近分析哲學的風格，在分析操作上就是嘗試從文本語言中搜尋隱藏在其中的意識形態。

有趣的地方正是在這裡，不論是文化研究，亦或是批判論述分析的學術社群，對 van Dijk 的理論架構所存在的異質性似乎多數都選擇忽略。這是不是與 van Dijk 所選擇的分析策略，是當代主流文本與論述研究學術社群早就拒斥的分析哲學立場有關？以 2001 年澳洲 Wollongong 大學傳播與文化研究的講座教授 Chris Barker 與英國 Wolverhampton 大學的 Dariusz Galasinski 合著的《文化研究與論述分析：語言與認同的對話》（*Cultural Studies and Discourse Analysis: A Dialogue on Language and Identity*）為例，在這本著作中作者選擇了一個很少學者處理的課題，即文化研究與批判論述分析途徑之間的對話與整合。作者認為批判論述分析做為一種途徑，可以在語言學的層面拓展文化研究的觸角與領域，但作者在梳理文化研究與批判論述分析途徑的語言學立場時，又清楚交待所有待分析的「論述」都是「社會建構」（socially constitutive）的，那麼在語言學立場上完全沒採取社會建構論的 van Dijk 又該如何處理呢？在這本著作卻是完全沒有觸及，僅只在書中附帶提及 van Dijk 的若干片斷主張，至於針對 van Dijk 的理論架構則是完全沒有處理（Barker & Galasinski, 2001）。

當然，由於 van Dijk 的理論架構中納入了當代學界中使用「論述」這個概念，而這個概念在當代學術思潮又最具複雜性與爭議性，因而一定會碰到「論述觀」的爭議局面。2001 年由社會心理學者 Margaret Wetherell 等人所編著的《論述理論與實際》（*Discourse Theory and Practice: A Reader*）一書，幾乎儘可能的納入了所有各門派的論述理論，也收入了 van Dijk 在 1993 年撰寫的一篇通論性論文《批判論述分析的原則》（*Principles of Critical Analysis*; van Dijk, 1993b），而 Wetherell 在編者導言中引介 van Dijk 的分析架構時，附帶的拿其與 M. Foucault 的論述理論加以對比，這個對比倒是點出了 van Dijk 的論述觀點與其他分析策略的基本差異。在 Wetherell 看來，Foucault 所謂的「論述」，不僅形塑了心靈（mind），也建構了社會世界；但 van Dijk 所謂的「論述」，則只是待研究的語言客體（linguistic object），與心靈及社會關係呈現著互動的關係。這種對比如果拿論述與權力的關係來檢視更明顯，Foucault 認為是論述（或知識）建構了權力與權力關係，但 van Dijk 則只是從既有權柄者的言談與文本去分析論述如何維持權力（Wetherell, Taylor, & Yates, 2001, pp. 288-289）。Wetherell 這段對比的討論，雖然只是點到為止，但對區隔 van Dijk 與其它文本與論述分析策略的差異，卻是有很大的幫助。

比較算得上實質對話的景況，是 1995 年 5 月 17 日在英國伯明翰的 Aston 大學專門為 van Dijk 的理論所辦的一場研討會。在這場研討會中，van Dijk 宣讀了一篇《論述、意見與意識形態》（*Discourse, Opinions and Ideologies*）的論文，會中同時邀集了許多專研意識形態理論的專家與 van Dijk 對話，同時並由來自英國拉夫堡（Loughborough）大學的社會學者 Michael Billig 撰寫專文針對 van Dijk 的論文進行評述。Billig 在批評 van Dijk 處理意識形態的分析策略時，認為其中存在

了一個重要盲點，即 van Dijk 在啟動分析時，理所當然的只選擇帶有價值判斷的命題進行分析，而將其它純事實描述的命題捨棄不論，Billing 認為即便是事實命題，這個命題也是一種「事實的社會建構」（social construction of fact）。換言之，能夠將特定且離散的語言學元素建構成一個「事實」論述，怎麼可能會完全擺脫意識形態的牽絆？將這一部分剔除在分析界域之外，反而忽略了隱藏在其中可能被發掘的意識形態（Billing, 1996, pp. 56-57）。Billing 的這段評論，正就是建構論的語言哲學的立場，也等於是從文化研究途徑立場出發對 van Dijk 理論所進行的評論，算是這兩種觀點之間很罕見的一次學術對話。

順著 Billing 對 van Dijk 分析架構的批評，在文化研究領域中同樣致力於媒體中的種族主義研究的 Stuart Hall，恰恰好可以拿來與 van Dijk 觀點做一個對比。Hall 與 van Dijk 一樣，同樣關注種族主義的議題，但 Hall 所採取的就是建構論的觀點，他在處理媒體建構或複製種族主義時，特別強調媒體對「種族主義自然化」（naturalizing racism）所發揮的作用。亦即就是將種族主義客觀化成一種理所當然、自然而然的「常識」，既然已經是常識，那麼就可以讓種族主義的意識形態色彩變得無影無蹤，變成「自然而然」的一種現象。甚至在其中最可能被質疑的部分，大部分不會在媒體中被表述出來。Hall 認為媒體文本對種族主義的再現中，有一種他稱之為「推論的種族主義」（inferential racism），即若干表面上看起來十分自然而然的事實論述，實際上都是將種族主義的前提毫無爭議的包含在其中（Allan, 1999, pp. 158-159）。換言之，在 Hall 看來，即便是被 van Dijk 認定為純粹事實陳述的命題，可能都瀰漫著意識形態的內涵。

事實上，Hall 可以說是文化研究領域中在問題意識上與 van Dijk 最相近的學者。在這裡不妨拿 Hall 所提出的「製碼／解碼」

(encode/decode) 分析架構與 van Dijk 的分析架構做個對比 (Hall, 1973)。這種對比有趣的地方在於，兩個分析策略都嘗試要從文本中解讀出意識形態，Hall 是要對文本進行「製碼／解碼」，而 van Dijk 則是要處理論述的生產與理解；Hall 強調意識形態如何介入文本「製碼／解碼」的過程，而 van Dijk 也同樣關注意識形態是如何透過論述再生產出來。這中間關鍵的差異在於，van Dijk 對論述「生產／理解」的分析基本上是循意義生產與理解的兩端尋求論述的「正解」，而非意義解讀的「分歧與差異」；但在 Hall 看來，閱聽人在詮釋符號意義時，有時確實可能與生產符號的製碼者完全一致。Hall 將這種定義模式稱之為支配式 (dominant) 模式，但 Hall 認為這只是解讀文本的模式之一，因為有些時候閱聽人很可能只接受製碼者的部分定義，讓文本的解讀形成一種協商 (negotiated) 的模式，甚至有些時候製碼者與解碼者之間對文本的立場形成完全對立 (oppositional) 的情勢 (Devereux, 2007, pp. 82-83)。相較於 Hall 對詮釋者的強調，van Dijk 對論述的批判分析，其實類似於 Hall 理論架構的支配模型。換言之，van Dijk 分析策略所致力重建的，正是追究論述生產這一端的原始意義，這個解讀是指向單一的「正解」，而非讀者中心的「多解」。這一點是在拿 van Dijk 分析架構與文化研究做對比所特別需要注意的。換言之，van Dijk 的分析策略，如果從文化研究的觀點看，依舊還停留在「作者論」的階段。這或許也就是文化研究與批判理論的倡議者沒太理會 van Dijk 理論的地方。

不論是從建構論的語言哲學視角，抑或是從文本解讀的多元視角來與 van Dijk 的分析策略加以對比，都不難看出 van Dijk 理論架構所存在的局限性。畢竟在觸及如意識形態這般複雜糾葛的議題上，van Dijk 所致力從事的僅只是從日常語言的密碼中去尋找隱藏在其中的意識形態，對於意識形態本身所具有的規制或建構功能，乃至不同詮釋者如何介入

對語言文本中意識形態的解讀，就必須借助 van Dijk 理論以外的分析策略了。

陸、結語

本論文嘗試從理論系譜的梳理中，為 van Dijk 的分析策略做一個還原式的梳理。在學術傳承上，van Dijk 是道地地地的語言學者出身，從他自己所撰寫的學術自傳即不難理解，van Dijk 早期的學術興趣，偏向純語言學的鑽研，針對文本論述的總體語意分析即是他的學術創見。一九七〇年代，他受到認知心理學的影響，開始關注語言背後心理脈絡的影響，亦就是論述的「生產與理解」問題，在這裡他又與語意學的傳統接上了軌，隨著一九八〇年代以後西方學術社群「語言轉向」、「實踐轉向」的大趨勢，van Dijk 開始關注實質層面的種族主義議題，也加入了批判論述分析的學術社群。近三十多年來，不論是在批判論述分析途徑的理論開發上，或是在種族主義實質問題的探討上，都出版了不少重要著作。然而審視 van Dijk 的學術傳承與理論開發，不論是在批判論述分析的學術社群，抑或是在當代文本分析理論脈絡中，都是獨樹一幟。他是批判論述分析學術社群中，唯一關注心理學層面的學者，也是唯一援引分析哲學語言分析策略的學者，更是將問題意識集中關注種族主義議題的學者。然而也必須承認的是，儘管已有不少學者應用 van Dijk 的分析策略進行實例的探討，針對他的分析策略進行定位與評述的討論卻是相對稀少，這一點也正是本論文撰寫的主要旨趣。

也可以說，本論文主要是想嘗試從後設的層面，檢視這位在當代批判論述分析途徑的主要倡議者，如何循一套特殊的語言學分析技巧，從特定語言文本中解析出一組意識形態的論述。儘管 van Dijk 將他的分析

策略定位為是「批判的」(critical)，但不同於其他左翼的批判理論家，van Dijk 對那些直指社會矛盾、帶有實踐意涵的結構批判顯然興趣不大。換言之，van Dijk 並不特別關注意識形態在鞏固或顛覆霸權支配上所發揮的功能，而是選擇關注主流社會精英的日常言談與文本中，究竟隱藏了那些意識形態的密碼，特別是涉及種族主義的部分。在 van Dijk 看來，這中間最具學術旨趣的地方，就是任何形式的種族主義在當代主流論述中早已經被定位為「政治不正確」，因而不可能有任何精英敢於公開倡議或頌揚種族主義，可是種族主義在實存上根本沒有消失，而是以一種更幽微、更隱諱的方式隱藏在語言修辭中，甚至為了有效掩飾，言說者還會聲稱自己「不是種族主義者」，甚至「反對種族主義」。在這樣的氛圍下，如何從一組看似客觀中立的語言文本中識讀隱藏在其中的意識形態，正是 van Dijk 的分析策略所要嘗試解答的問題，而 van Dijk 對研究者所提供最大的助益，就是他提示並示範了一套語言學的分析程序與技巧，如意識形態方陣、主題選擇、語意移動、局部連貫、風格與修辭等分析策略，引導研究者如何從語言文本中，發掘隱藏在字裡行間的意識形態。本論文亦就是嘗試為 van Dijk 這個特殊的學術貢獻，理出一個系統性的頭緒。

如前所述，國內傳播學界對 van Dijk 的批判論述分析架構並不陌生，但對 van Dijk 在意識形態與種族主義上的研究貢獻卻相對忽略，這種切割導致國內許多研究者援引 van Dijk 的分析策略時，處理的多半不是意識形態的議題，這一點未嘗不是學術開發上的憾事。以台灣當下意識形態對立的嚴重，背後存有的意在言外、不能言明的族群與國家認同張力，呈現在政治乃至媒體平台上待進一步分析的素材實在太多了。嘗試想想，有多少宣稱客觀中立的論述，實際上卻挾帶著認同政治的張力？這些論述文本，正是 van Dijk 的理論架構可以著力的地方。此外，

近十數年在台灣迅速崛起新住民議題（如外籍新娘、外傭、外勞等），在族群平等與尊重已成社會主流的前提下，許多的歧視與敵視其實也都隱藏在修辭中，這一點同樣也是 van Dijk 的架構所可能提供的最大助益。

參考書目

- 施盈廷、劉忠博與張時健譯（2011）。《反身性方法論：質性研究的新視野》，台北：韋伯。（原書 Alvesson, M. & Skoldberg, K. [2000]. *Reflexive methodology: New vista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 London, UK: Sage.）
- 翁秀琪（1998）。〈批判語言學，在地權力觀和新聞文本分析：宋楚瑜辭官事件中宋李會的新聞分析〉，《新聞學研究》，57: 91-126。
- 張錦華（1994）。〈新聞的真實與再現：以李瑞環事件相關報導為例〉，臧國仁（編），《新聞「學」與「術」的對話》，頁 1-24。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
- 張錦華（2011）。〈從 van Dijk 操控論述觀點分析中國大陸省市採購團的新聞置入及報導框架：以台灣四家報紙為例〉，《中華傳播學刊》，20: 65-93。
- 臧國仁（1999）。《新聞媒體與消息來源：媒介框架與真實建構之論述》。台北：三民。
- 鍾蔚文（1992）。《從媒介真實到主觀真實》。台北：正中。
- 蘇子喬譯（2009）。《政治學的關鍵概念》，台北：五南。（原書 Heywood, A. [2000]. *Key concepts in politics*. New York, NY: Macmillan.）
- Allan, S. (1999). *News culture*. Buckingham, UK: Open University Press.
- Barker, C., & Galasinski, D. (2001). *Cultural studies and discourse analysis: A dialogue on language and identity*. London, UK: Sage.
- Billig, M. (1996). Discourse, opinions and ideologies. In C. Schaffner & H. Kelly-Holmes (Eds.), *Discourse and ideologies* (pp. 54-59). Clevedon, UK: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 Devereux, E. (2007). *Media studies*. London, UK: Sage.
- Fowler, R. (1991). *Language in the news: Discourse and ideology in the press*. London, UK: Routledge.
- Hall, S. (1973). *Encoding and decoding in the television discourse*. Birmingham, UK: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 McQuail, D. (1994).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 (3rd Ed.). London, UK: Sage.

- McQuail, D. (2000). *McQuail's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 (5th Ed.). London, UK: Sage.
- Mills, S. (1997). *Discourse: The new critical idiom*. London, UK: Routledge.
- Schaffner, C. & Kelly-Holmes, H. (Eds.). (1996). *Discourse and ideologies*. Clevedon, UK: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 Seliger, M. (1976). *Ideology and politics*. London, UK: Allen & Unwin.
- van Dijk, T. A. (1987). *Communicating racism: Ethnic prejudice in thought and talk*. Thousand Oaks, CA: Sage.
- van Dijk, T. A. (1988a). *News as discourse*. Hillsdale, NJ: Erlbaum.
- van Dijk, T. A. (1988b). *News analysis: Case studies of international and national news in the press*. Hillsdale, NJ: Erlbaum.
- van Dijk, T. A. (1991a). *Racism and the press*. London, UK: Routledge.
- van Dijk, T. A. (1991b). The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of news as discourse. In K. B. Jensen & N. W. Jankowski (Eds.), *A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methodologies for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pp. 108-120). New York, NY: Routledge.
- van Dijk, T. A. (1993a). *Elite discourse and racism*. Thousand Oaks, CA: Sage.
- van Dijk, T. A. (1993b). Principle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Discourse & Society*, 4(2), 249-283.
- van Dijk, T. A. (1995a). Discourse semantics and ideology. *Discourse & Society*, 6(2), 243-289.
- van Dijk, T. A. (1996). Discourse, opinions and ideologies. In C. Schaffner & H. Kelly-Holmes (Eds.), *Discourse and ideologies* (pp. 7-37). Clevedon, UK: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 van Dijk, T. A. (1997a). Political discourse and racism: Describing others in western parliaments. In S. H. Riggins (Ed.), *The language and politics of exclusion: Others in discourse* (pp. 31-64). Thousand Oaks, CA: Sage.
- van Dijk, T. A. (1997b). The study of discourse. In T. A. van Dijk (Ed.), *Discourse as structure and process Vol.1* (pp. 1-34). London, UK: Sage.
- van Dijk, T. A. (1998a). Opinions and Ideologies in the press. In A. Bell & P. Garrett (Eds.), *Approaches to media discourse* (pp. 21-63). Oxford, UK: Blackwell.
- van Dijk, T. A. (1998b). *Ideology: 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London, UK: Sage.
- van Dijk, T. A. (2000). New(s) racism: A discourse analytical approach. In S. Cottle (Ed.), *Ethnic minorities and the media* (pp. 33-49). Milton Keynes, UK: Open University Press.
- van Dijk, T. A. (2003). The discourse-knowledge interface. In G. Weiss & R. Wodak (Eds.),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ory and interdisciplinarity* (pp. 85-109). New York, NY: Palgrave Macmillan.
- van Dijk, T. A. (2004). From text grammar to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 brief academic autobiography. Retrieved from
<http://www.discourses.org/Form%20text%20grammar%20to%20critical%20discourse%20analysis.htm>.

- van Dijk, T. A. (2005). *Racism and discourse in Spain and Latin America*.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van Dijk, T. A. (2007). Ideology and discourse analysis. In M. Freeden (Ed.), *The meaning of ideology: Cross-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pp. 110-135). London, UK: Routledge.
- van Dijk, T. A. (2008). *Discourse and power*. New York, NY: Palgrave Macmillan.
- van Dijk, T. A. (2009). *Society and discourse: How social contexts influence text and talk*. London,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etherell, M., Taylor, S., & Yates, S. J. (2001). *Discourse theory and practice: A reader*. London, UK: Sage.

Uncovering the Hidden Ideologies of Everyday Language: van Dijk's Analytical Strategy and its Positioning in Media Studies

Yen-Yuan Ni*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analytical strategies and positioning of van Dijk—a scholar of contemporary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 paper uses the traceability of theoretical lineage to restore van Dijk's layout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discourse, cognition, and society. The paper also uses a case study to examine how van Dijk analyzed and identified a group of ideological discourse from daily language texts. This study positions the analytical strategy developed by van Dijk in a theoretical context. The results show that van Dijk's analytical framework is applicable to various contemporary discourse theories because his analytical framework includes semantic and syntax perspectives. This linguistic perspective makes van Dijk's analytical strategie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cultural studies. In the study of ideology, van Dijk's analytical framework can help researchers uncover hidden ideological passwords from everyday language or formal documents. This finding contributes to the study of Taiwanese media texts and ideology.

Keywords: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ulture studies, ideology

* Yen-Yuan Ni is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s Management, Ming Chua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e-mail: yyni@mail.mcu.edu.tw.